

第一部 大碰撞前的预震

第一篇 为新华社填补热点空白

1999年3月20日 北京

1998年，新华社有关职能部门几经调研和实地考察，最终报请社领导决定开设利雅得分社和加沙分社，以填补新华社在中东两个重要国家和地区沙特和巴勒斯坦的机构空白。这是新华社扩建驻外网点，继续朝着世界性通讯社目标迈进的两个具体措施，社里对此非常重视。

沙特是众所周知的伊斯兰教国家，教规严格，十分保守，历来拒绝任何非阿拉伯和伊斯兰教新闻机构在其境内设立常驻办事处，以防止对其报道过于负面或散布与阿拉伯传统和伊斯兰教教义抵触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新华社申请开设分支机构数年后终于开放绿灯，足以说明沙特政府对中国人民的信任，因为这是让许多著名西方通讯社羡慕而又无法企及的特许。

在筹备加沙分社的前期过程中，前社长郭超人分别致函巴勒斯坦新闻部长阿卜杜—拉布和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弗格尔，为新华社在加沙开设分社提出正式申请，并称未来的分社将有3—4名工作人员。当时的想法是，尽管我一个人去开点，但是必须把未来分社的人员编制申请下来。

很快，阿卜杜—拉布复函郭社长，表示非常欢迎新华社在加沙设立分社，巴有关机构愿意提供一切便利，同时希望新华社在约旦河西岸的拉马拉再开设一个分社（因为巴民族权力机构的日

常工作在拉马拉，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的官邸却设在加沙城)。弗格也回电表示欢迎新华社在加沙开设分社，并称愿意为分社记者发放采访证。同时提醒新华社，如果雇佣巴勒斯坦雇员，必须出具雇员的“良民证”(SECURITY CLEARANCE)。

但是，我的第一次入境签证申请被以色列拒绝了。据了解，以色列政府新闻办虽然同意我们在被占领土建立分支机构，但是其外交部和内政部似乎并不乐意看到中国官方的通讯社在巴勒斯坦人控制区长期设点，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等于中国对巴勒斯坦自治区的外交承认。根据以巴奥斯陆协议，巴自治地区的外交和国防由以方控制。其实，我个人认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新华社仅仅是个新闻单位，不具有任何外交职能，否则，我们驻以色列的分社就不会设在耶路撒冷这个有争议的地方而是设在我们承认的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了。

经过我驻以色列大使馆特别是大师哥张明参赞的多方努力，耶路撒冷分社首席记者戚德良也费了不少口舌，在我第二次申请人境签证时，以色列内政部终于对我放行。这时，距离新华社提出申请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而喻开元同志已经在沙特开始了他的筹建活动。

万事俱备，只欠签证的我准备上路了。

1999年3月25日 曼谷

今天，我携带着给分社添置的相机、便携电脑以及近百公斤的资料、工具书和个人物品踏上征程。由于行李过重，总社计财局同意我舍弃直飞特拉维夫的近路，转道曼谷，这样可以使经曼谷返回巴勒斯坦的师嫂王怡的几十公斤行李空额。而另外两箱行李托因工作需要而绕道叙利亚的师哥李琛带走。说来惭愧，我离家之时，椎间盘旧疾正在和我找别扭，是李琛夫妇帮我把行李从家门口搬上新华社轿车的。瘦小的王怡在曼谷转机时也为我付

出了额外的体力，真可谓帮忙帮到家了。

我是一大早出的门。女儿亮亮仍沉浸在甜美的梦中，两岁半的她根本不知道从今天起，将好长时间见不到自己的爸爸。亮亮是我和夫人抱大的，或许是我身体比较温暖，或许是我块头比较大，每次亮亮有病或夜间哭闹时反而愿意投向我的怀抱。今后，我将不再承受做父亲的肌体劳苦，当然更无法享受女儿带给我的无限快乐，这是我最为割舍不下的。

夫人看着我俯下身吻别甜睡的女儿，一言不发，眼泪却不断地往下流。我强忍着心中的难过轻轻拥抱了一下她，吻吻她的前额默默出门了。此前夫人曾正告我，无论如何要平安回来，如果我无谓地死在外面，她和女儿是不会为我哭泣的，也永远不会原谅我的。

我离开了新华社鲁谷小区家属大院，眼里含泪的岳父岳母把我送上了前往机场的汽车。夫人没有露面。她很少送我出门，因为她非常容易流泪而又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流泪。大院南去百米处，一列火车正长鸣着快速驶过，似乎也把我的心载向看不见底的未来。

第二篇 “安全第一” 无处不在

1999年3月28日夜，曼谷——特拉维夫途中以色列航班上
28日晚，曼谷分社首席于大波和高原夫妇和助手许海静在招待我们吃过饺子后，开车把我们送到曼谷国际机场。高速公路上海灯迷离，让人感觉行驶在星河里。大波和高原的悉心照顾，使我没有“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不便和迷茫，对曼谷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午夜的曼谷机场人已经不是很多，我们在机场大厅的一个拐角找到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窗口。其实，当时只有以航的班机在为飞行做准备，所以这个拐角显得非常热闹。上百名各色乘客在排队等待安全检查，而进行安检的以色列安全员却不紧不慢地严格履行着他们特有的一道道手续。尽管事先我已经知道以航是盘查最严厉、最细致的航空公司，在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以下简称巴办）担任三秘的王怡也向我交代了他们大概要问些什么问题，但是他们的精细和礼貌程度还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轮到我时，一位男安全员要我把自己的行李拎到一个类似板条凳的简易木桌上，开始对我进行盘问。当他得知我持公务护照并随身带有以政府新闻办主任的赴任回函复印件时，又把我移交给一位中年女士。我以为靠着上述两件护身符能免去许多麻烦，但这位神态温和的女士并没有给我任何特权。回头看看旁边持红皮外交护照的王怡同样在接受礼貌而细致的盘查，我才明白了在

安检面前和以色列人没的商量。

“欢迎您乘坐以航班机！为了您和其他乘客的安全，我们冒昧地要打搅您一会儿，请您原谅。”在这几句开场白后，这位女士开始了一连串的快速询问，而且是同一问题变着法儿前后问三遍，看你是否前言不搭后语：

“请问您是第一次乘坐以航吗？”

“您的目的地是哪里？”

“您从哪里出发来到曼谷？”

“您到以色列后住在什么地方？”

“您到以色列干什么 准备呆多久 有没有朋友和亲戚？”

“您在离开北京和曼谷时有没有朋友或熟人托带东西？”

“您的行李是自己亲自打的吗？打好行李后放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交给别人保管过？是否离开过您的行李？行李箱里都有些什么物件？”

“再问您一边 您……”

如此三遍，她微笑地问着，眼睛却一刻不离开我的脸，仔细地观察着我的面部表情以探测我的内心是否坦然，是否撒了谎。旁边的许多以色列本国旅客被要求打开行李仔细翻看，而我为了节省时间或证明自己的清白主动提出开箱查验，这位女保安却友好地按住我的手表示不必开箱……

当然，问话过程中，我虽然没有任何可疑物品而惧怕检查，但是这种阵势毕竟从未见过，以致有两句简单的英语问话我都没有听懂，还是习惯了“以色列英语”和问话内容的王怡提醒了我一下，但是，安检人员很快礼貌地制止了她并把她请到了一边。

以色列是个缺少安全感的国家。犹太民族在一千多年的流散岁月中吃尽了苦头，也培养了他们民族性格中的机警、多疑和敏感的成分。在回归巴勒斯坦几十年后，以色列人又三面受敌，长

期处于战争状态，可以说是枕戈待旦，“安全”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恐怕已远远高于上帝。在同周围阿拉伯人的武装对抗中，以色列也曾多次遭受飞机被劫持的经历，品尝过无辜人员喋血的苦果，因此，安全检查就变得格外严厉，以致于到病态的地步。

据一位朋友回忆，他几年前返回以色列在北京机场登机接受安检时，以方安检人员听说有人托他带东西到以色列，立刻如临大敌，马上安排其他旅客疏散并进行清场，在对这位朋友捎带的物品进行仔细检查确保没有危险后才解除警报，搞得大家虚惊一场。

其实，由于安检的疏忽，我手提的行李包在曼谷机场并未经过 X 光检测，我事后心想，以色列人也真是形式主义，这要是包炸弹和非法用品不也被我拎上飞机了吗？可见百密难免一疏，安全隐患往往可能就存在于这种信任和侥幸间。

完成安检后，我和王怡告别了大波他们，进入候机室。以色列航班的候机室同样设在候机楼的尽头。临登飞机前，我们和其他乘客又接受了安全人员的盘问，只是这道安检要简单得多，同样，部分乘客的手提行李被打开检查，而我们半是由于护照做担保，半是相貌原因而免去了这道手续。

乘以航从北京飞往特拉维夫是午夜起飞，听说乘以航从开罗飞往特拉维夫也是午夜起飞，而乘以航从曼谷到特拉维夫还是在午夜时刻起飞。这难道是一种巧合？我想不是，显然这是以航精心安排的，选择这个飞机起落班次最少的时间段显然是为了便于利用人少的清静进行仔细的盘查，这样既不妨碍别的航空公司的营业，也不过于引人注目，更重要的是不给恐怖分子乘乱做手脚的机会。

1999 年 3 月 29 日 耶路撒冷

经过 11 个小时的飞行，我于今日清晨（以色列时间）抵达

特拉维夫本 - 古里安机场。当巨大的波音 767 客机轰然着地时，我的心也跟着落到了实处：终于到了这块诞生了《圣经》而又因《圣经》而扬名的古老土地。

几年前，新华社选派记者到以色列学习希伯来语时我就跃跃欲试，只是阿文组老主任王根宝提醒我做好一辈子和以色列人打交道的准备时我才打了退堂鼓，因为我的确不愿意因为是稀有人才而被终身拴在一个国家。但是，能到神话般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工作一直是我非常向往的，如今，我不但突然间实现了这一愿望而且直接要到热点中的热点加沙去筹建分社，却是我始料不及的，心中半是愿望得酬的激动，半是前途未卜的忐忑。

出了飞机，几面蓝白两色以色列国旗在朴素的本 - 古里安机场上空微微飘扬，两道蓝色的横杠，中间夹着规则的六角大卫盾星。过去我对以色列国旗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电视画面和报刊上，而且多半是被作为焚烧和糟蹋的对象。如今，洁净、庄重的以色列国旗恬静地展现在我的面前，使我产生了说不清的感觉。眼前的大卫盾星旗不仅仅是以色列国的象征，而且是无数杰出犹太人的象征：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现代物理学之父爱因斯坦；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迷宫小说鼻祖卡夫卡，伟大诗人海涅，立体主义绘画大师毕加索，表演天才卓别林，新闻巨匠路透、普利策，音乐泰斗门德尔松、格什温、科普兰、马勒、海菲茨、梅纽因、伯恩斯坦……群星璀璨，不胜枚举。

出关的时候，海关一位小姐又对我进行了一般盘问：“到以色列干什么？”“住在什么地方？”等等 这也是在其他国家的海关比较少见的，可见以色列的安全意识已经在任何环节上都打下了烙印。未了，这位小姐反复翻看了弗格尔的复函影印件，又给上司挂了个电话，最后在我的护照上盖戳，将 3 个月的停留期限改为一个月后放行，至此，我算真正进入了以色列。

耶路撒冷分社的两个小兄弟谭新木和戴维接着我并同王怡暂

时告别后，三人到停车场准备前往分社所在地。我们的车还没有开出停车场便被警察拦住了，过了一会儿小谭问清了情况，原来是停车场发现了不明物体，警方正在进行处置。在以色列，不明物体往往就可能是致命的爆炸物。小谭他们已经习惯了，我却觉得好生恐怖，怎么一下飞机就赶上这档子事，难怪以色列人那么重视安全检查。

可疑物品被清除了，我们继续上路，当时天已大亮，但是沿途的汽车无一例外地开着大灯，这又是件意想不到的事，小谭解释说，这是以色列的行车规定，为了确保安全，冬季在城外驾车必须开启车灯。我想这不是多此一举嘛，但是转念一想，如果能确保不出交通事故，多一道保险总是对的。由此我觉得，以色列人的安全观念可以说无处不在，这里不仅仅是相对于恐怖事件的安全措施，就连正常的行车规则也比我们多一项要求，可见发达国家还是比我们考虑得更周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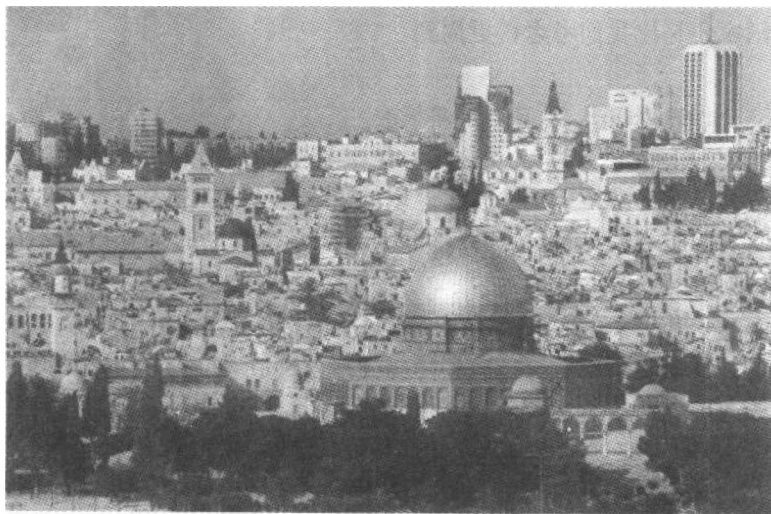
1999年3月30日 耶路撒冷

29日晚，分社首席老戚为我摆宴接风，我第一次品尝了以色列出产的啤酒，也领教了老戚的豪爽和能干。还是在曼谷时就听泰国雇员说老戚烹调手艺不错，吃了老戚烧的菜觉得名不虚传。

不知是旅途劳顿还是酒精的作用，昨晚我没有在酒桌上醉倒，却在睡梦中被魔住：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古老青灰的圆顶像大山般向我压来，我直觉得四肢无力，呼吸困难，想翻身却丝毫动弹不得，眼睁睁看着巨大的清真寺圆顶像比萨斜塔一样一寸一寸向我压迫而来。我当时心慌乱求神，又是用英语念叨“上帝保佑”，又是用阿拉伯语疾呼“赞美真主”，只恨自己不懂希伯来语，否则定要继续企求犹太教的上帝保佑我不被这厚重庞大的建筑碾成粉齏。

不知挣扎了多久我终于逃出了梦魇，带着浑身的汗水艰难坐起。拉开厚厚的窗帘 室外天已微白 灯光围绕下的以色列议会大厦和历史博物馆仍静卧在依稀的夜色中，周围葱茏的树木融为淡然的一片 无法分出层次和树种。对面远山上的楼群灯光依稀 在天光的勾勒下露出长短和高低不一的轮廓。这就是西耶路撒冷？其实分社所在地西耶路撒冷，是整个大耶路撒冷的一部分。

我一直不明白，我还没有亲眼见过阿克萨清真寺的真实模样，它却在夜间像飞来峰一样突然“造访”我这个远方的陌生人。说冥冥之中和耶路撒冷存在一种默契 未免有些宿命论色彩 但是在耶路撒冷第一夜便被阿克萨清真寺镇住肯定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的结果。它预示着今后几年我将把耶路撒冷，把阿克萨清真寺的前途无可避免地当作我日常和中心的报道话题之一。



金色的耶路撒冷。

马晓霖 摄

第三篇 加沙给我个下马威

1999年3月30日 加沙

今天上午，我在戴维陪同下到以色列政府新闻办拜见了弗格尔主任，并递交了郭超人社长的介绍信。以色列的政府新闻办朴素简陋，总共没有几间办公室，不像个部级机构的样子，甚至不如中国一个普通的民营企业的总部，以色列政府的务实和廉政建设由此可见一斑。弗格尔是个瘦高个儿，戴副眼镜显得文质彬彬，上身只穿了件衬衣，看样子不过40多岁，精明干练。他笑呵呵地对我表示了欢迎，并简单问了问我有关新华社加沙分社的筹建规模。

经过一阵交谈，弗格尔肯定发现我的英语讲得不够纯正，于是突然问我是不是讲阿拉伯语。当我告诉他我的第一外语是阿拉伯语但也在科威特做过英文记者时，他高兴地点头说好好好！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英语同为以色列的官方语言，身为利库德集团成员的弗格尔未见得因为我能讲阿拉伯语而高兴，显然是表示一种政治姿态，即犹太人不歧视阿拉伯人，自然也不歧视阿拉伯语。临告别时，弗格尔递给我一张名片，称在被占领土采访如需帮助时只管给他打电话。

告别了弗格尔，我又很快办好了临时记者证。吃过午饭后，我请戴维送我直接前往我的终极目的地——加沙。耶路撒冷海拔1000米左右，而加沙地处地中海海滨。在从耶路撒冷前往加沙

的路上，大气压随着地势高度的下降而逐步发生变化，初来乍到的我颇不适应，耳鼓发胀，耳边轰轰作响，有一种乘飞机俯冲下降的感觉。好在沿途葱绿的田园风光让我赏心悦目，我们在交谈中很快开到了耶路撒冷西南 90 公里远的加沙地带。

到了加沙地带入口处的埃雷兹检查站，师嫂王怡和巴办商务一秘老冯也按时赶到，把我和行李接上车，在办理了简单的入境手续后，进入加沙地带。眼看着检查站外与我挥手道别的戴维以及碧绿无垠的以色列田园，再回头看看加沙境内光秃秃的凄凉景象，我顿时觉得自己像 70 年代的知识青年一样，背负着神圣的使命，告别了繁华舒适的大城市来到了一个陌生而艰苦的环境中“插队落户”。

加沙并不是广阔天地，但却是世人瞩目的地方，今后几年内我将在此做历史的记录者，见证加沙及整个被占领土每一天的变化和发展。可是能否大有作为，我的确心里没有底。

王怡和老冯带着我进入了加沙，沿途向我介绍着加沙的一些街道和建筑。可是，在我的眼里，加沙是那么的陈旧和拥挤，如果不是街上无处不在的阿拉伯标语和与落后不相称的众多小汽车，我会以为自己回到 1991 年考察贫困山区的中国西南省份的边远小镇。

今天是巴勒斯坦人“国土日”，加沙却相对平静，沿途没有看到想象中的游行示威活动，这使我对加沙的第一印象产生了错觉。

穿过街面杂乱、房舍低矮的老城，我们来到高楼四立的新区，很快，一片湛蓝的水面透过楼缝展现在我的面前，我顿时兴奋起来：是地中海！只要有大海，再单调的生活都会泛起丰富的浪花。在加沙游地中海，是我行前浮想再三的美好生活，这种生活多少可以补偿北京没有大江大海只有人山人海带给我的缺憾。

我被拉到一套临时租下的套房，这里有电视、冰箱、洗衣机

和煤气灶，也有不算干净的铺盖和沙发以及简单的锅碗瓢盆，对付基本的生活需求已经足够了，可是月租高达 800 美元，这却让我意想不到。

打开水龙头，里面流出的水又咸又涩，无法饮用，据了解是淡化后的海水，我只好下楼买瓶装的饮用水。第一顿饭我只吃了几个面包，喝了点冷水将就了。

加沙第一个夜晚真是不顺，我从外面溜达回来后发现整个小区都黑乎乎的，门房说是临时断电。黑暗中，我摸索了半天才把屋门打开，关门转身后刚摸了两步脑袋就撞在开启的一扇窗框上，在我疼得呲牙咧嘴、眼冒金星本能地往后闪身时，后脑勺又当地磕在另一面墙上，心中的无名火顿时上升，先前的那种兴奋立刻下挫。我强忍着疼痛就地不动足足呆了 5 分钟，眼睛才适应了屋里的环境，朦胧看见哪里该下脚。

这套房子的几间屋子门门相套，不时有门窗被风吹得咣当响，让我心里发毛。于是，我又摸黑挨个把各屋门窗插上，以免初来乍到成为盗贼光顾的对象。今天晚上，我是就着电脑屏幕的亮光敲下这片日记的。天黑地不熟，无所事事，我得早点睡了。

第四篇 奔向炸弹响起的地方

1999年4月5日 星期一

今天晚上，我第一次经历爆炸，而且第一次同平时只在媒体中见到的爆炸拉近了距离。这起爆炸粉碎了一周来我对加沙安全形势比较乐观的概括。

晚上刚刚吃完自己煮的盐水鸡翅，窗外传来一声巨响，我扭头一看，墙上的挂钟正指向9点18分。就在我靠近窗口试图判断巨响来自何方时，远处传了救护车的鸣叫声。我立刻断定附近发生了爆炸，于是抄起刚刚从巴办借来的手机向楼下窜去。

楼下撞见几个邻居和行人，但是他们都不能断定响声来自哪里。我转念一想，往北100米处是巴勒斯坦二号人物阿布-马赞的住宅，那里有几名安全部队的警察，他们或许会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我飞奔过去自报家门，一问果然发生了炸弹爆炸，地点就在一公里外的安萨里大街。

我立刻通过手机把这一情况通知耶分社老戚，请他代发英文快讯，并将这一情况通报给巴办主任刘志海大使。随后，我立刻拦截住经过身边的一辆黄色出租车。当时车里连司机带乘客已经塞满了8个人，我只好半跨半坐在前排一名汉子的膝盖上，并催促着司机跟着前面闪着红蓝灯光的警车往出事地点急赶。

两分钟后，我赶到了事发地点的路口，警察已经封锁了道路，禁止任何车辆通行，我只好弃车步行。等我想到还没给司机

车钱而回头时，那辆出租车已经绝尘而去，没有人下车看热闹，也没有人等我付那份车钱。

爆炸发生在安萨里大街加油站对面的一座两层楼私宅里，这里距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的官邸只有 200 米，距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总部只有 100 米，而离阿拉法特卫戍部队“17 部队”的驻地只有 50 米。

经过和警察反复交涉，我获准进入警戒圈内，这里只有少量住户围观，大部分是穿各种服装的警察，我好像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记者，因此很快溜进了炸弹现场。据悉，这幢小楼的主人叫穆萨费尔·阿戈尔，是阿拉法特卫戍部队的校官。从爆炸遗留的痕迹看，炸弹是在小楼门厅里爆炸的，只炸碎了几块玻璃和一张木桌，并轻微地损坏了院子里的一些花草，乱砖碎石飞出一大片。

由于爆炸发生时阿戈尔正巧不在家，因此毫毛无损。据加沙市政府一位人士透露，穆萨费尔曾在黎巴嫩英勇抗击过以色列军队，很受巴各方面的敬重，因此可以排除是内部人搞他的可能性，言外之意是以色列特工搞的鬼。

很快，我被后续赶来的警察请出了现场，一个自称为法新社工作的当地小伙子也受到了警察的盘问后被推了出去。半个小时后，阿戈尔赶回家里，面对一片狼藉的现场，他表现得很平静，一言不发地走了。这起爆炸虽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但是目标特殊，而且离总统府不远，因此惊动不小，连加沙地带的安全部队司令都赶来了。

在通过手机发完后续消息后，我赶回住所编写中文消息，期间，刚刚认识的两个巴安全部队的朋友又上门拜访，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等我写完消息已是午夜时分了。临时住所没有电话线，平时发稿都是带着电脑到办事处去。现在，时间太晚，而刘大使身体又不太好，我半夜打搅显然不合适。这个消息通过手机

打电话给北京又似乎不值，想来想去，我决定找新认识的邻居哈立德帮忙。哈立德是位退休警察，一家老小全在突尼斯，只有他老头一人在加沙守着房产。昨天我应邀上门做客时他曾告诉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去找他帮忙。

我穿过没有路灯的小巷子，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了哈立德家所在的楼前。我知道夜已深，但是知道哈立德和其他巴勒斯坦人一样是夜猫子，应该还在喝咖啡聊天吹牛。但是到了门房那儿一问才知，哈立德今天身体不爽，已经早早入睡了。忠实的门房叮嘱我说，如果不是十万火急的事最好别打扰他。

正在踌躇间，一辆小型吉普车停在楼前，车上下来二老一小，像是一家三口。其中头发花白的长者问我有何贵干？我说自己是来自中国的新华社记者，因为有条重要的消息要通过文传发回北京，不知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文传。

这位穿西装的长者说“请你等一下”，便领着他金发碧眼的夫人和儿子上了楼。几分钟后，这父子俩走出楼门，邀请我上他们的吉普车，说要带我去办公室发稿。我当时非常感激。长者自我介绍说他在工程建设部工作，今天和夫人（法国籍）及小儿子去了趟约旦河西岸城市拉马拉，刚刚到家就碰到了求助的我。

从加沙到拉马拉往返 300 多公里，他们老的老小的小如此辛苦一天后又给我帮忙，真是不容易，我都后悔不该向他开这个口。别看长者的儿子不到 20 岁，可是车却开得很棒，一张小手把大吉普车的方向盘揉得提溜转。

很快，这爷俩带我到了城里的办公室，并帮我发通稿子后又顺道送我回家。来回的路上，长者没有告诉我他的尊号大名，而是在告别时递给我一张名片，并欢迎我有空上他家做客。

带着完成任务的愉快和贵人相助的庆幸，我回到住所。在明亮的灯光下我摸出了刚刚收到的那张名片。不看还好，看了这张名片让我顿时觉得巴勒斯坦人民真是慷慨而古道热肠：朴素的名

片上有这样几行字：阿拉法特主席经济顾问、巴工程建设部总司长——戴义夫拉·阿赫拉斯。

多么虔诚、谦虚而乐善好施的一位高级官员！他的名字如果翻译成阿文的话，那便是“真主的哑巴客人”。